

理论同期声

让文化遗产有尊严

——知名学者单霁翔在《共富善治大讲堂》上的精彩观点



二,过去文物保护仅关注物质要素,而运河保护涵盖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文化遗产保护还需重视非物质要素。其三,过去文物保护多为静态保护,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万里长城等均已失去最初功能,如今成为研究与观赏的对象。而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对活态、动态元素的保护,例如江南水乡、传统街区和村落、民族村寨等。像周庄、乌镇等江南水乡,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与民俗活动,是活态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其四,过去文物保护重视古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却忽视了当代、现代遗产的保护,如今我们同样要保护当代遗产以及二十世纪的遗产。其五,文物保护的对象从一座桥、一座塔、一个古建筑,逐步扩展至历史建筑群、历史街区,随后又延伸至历史城市,实现了从点到面的拓展。但在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后,我们还需保护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人类迁徙的廊道。其六,文物保护往往聚焦于宫殿建筑、寺庙建筑、历史性建筑、纪念性建筑,而如今文化遗产保护还需关注普通民众生活生产相关内容,如乡土建筑、传统民居、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等。

自2003年我们开始关注大运河,至今已逾20年,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从最初单纯将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到进一步使其“美化提升”,改善景观品质,再到如今追求“活化利用”,使其融入现代生活并发挥多元价值,大运河在这三个阶段中发生了切实且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大运河自身,更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首先,以何种态度进行保护?通过大量实践,我们认识到保护并非最终目的,利用也不是。过度保护古建筑,如修缮后封闭起来不让人们接触,反而会加速其腐朽;过度利用文物则会导致其损毁。那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才是根本目的。其次,由谁来保护?如今,这些文化遗产已融入我们的生活、社区和工作环境,文化遗产保护不再是政府的专属职责,也并非文物部门的单一工作,而是亿万民众共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权利。只有亿万民众共同守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它才能得以永续传承,这便是在保护文化遗产过程中形成的新认识。

杭州是一座拥有丰富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其第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是西湖,第二项是大运河。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是活态的,是流动的文化,是触手可及的人文生活。我们要让大运河活起来,发展成为“有尊严”的文化遗产。

起初,对于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认为其主要价值体现在水利工程与交通工程方面。然而,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大运河、编制并修改保护规划及申报文本,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一处具有百科全书般丰富内涵的景观,与整个人文地理文化紧密相连。至此,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得以丰富。

通过保护大运河,我们获取了大量知识,真正实现了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存在显著差异。其一,文物保护侧重于文化要素,而在申遗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需要保护的是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因此还需兼顾自然要素。其

时间内竟发现了三重城墙。时隔不到10年,考古学家又在良渚遗址周边发现13条水利工程遗址,其中包含高坝、低坝以及长堤。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

良渚遗址的价值还体现在其促使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全新认识。在良渚遗址城墙被发现三周年之际,我们在良渚遗址召开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提出“我们的考古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这一口号。

长期以来我们期望将考古遗址转变为公园,但也有一些考古学家、历史学者乃至社会专家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考古遗址是科学研究的专属领域,而公园是供人们休闲娱乐之所,二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国内有些遗址区域内存有诸多棚户与企业,导致居民生活水平降低,遗址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每日都面临被破坏和侵占的风险。正如湿地、森林能够成为公园,人们走进湿地、森林,能切实感受到它们对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进而产生热爱与呵护之情。倘若考古遗址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无法体会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便会不断遭受破坏与侵占。因此,当高句丽遗址、殷墟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陆续成为世界遗产后,我们在此次会议上首次达成共识:考古遗址公园是保护考古遗址的重要手段。会议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共1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随后又陆续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

2019年,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中国一举成为与意大利并列的、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均为55项。但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一座教堂、一片葡萄园都可能被列为一处世界遗产。相比之下,我国的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等,无论从体量、价值,还是所承载的责任来看,都远超意大利的世界遗产。不过,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我们而言,排名第一与否并非关键,数量多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抢救并保护了大量珍贵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今,良渚遗址建成公园后,真正实现了如公园般美丽。其山水形貌、地形地貌以及稻作农业景观得以恢复,城市格局也得以展现。良渚原本是一座水城,9个城门中有8个为水城门,当时良渚先民通过竹筏可达上海,这些区域均属良渚的统治范围。莫角山宫殿建筑群的水塔拆除后,宫殿格局得以呈现,文物出土地点也进行了保护性展示。遗址附近还修建了一座精美的博物馆,集中展示了80多年来出土的以玉器为主的珍贵文物。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正式开园。由于我受聘担任公园顾问,所以每年都会前往学习,了解遗址保护情况。

令人十分感动的是,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我们打造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遗产地。此外,它也成为青年人学习的重要场所,每天都有学生前来开展研学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学习古人的制玉技艺、房屋建造方法等。考古遗址公园理应成为人们学习的重要课堂,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文化绿洲。

挖掘文化遗产多元价值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文物跟观众见面,这是保护的最好方法。如今,我肩负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之责。从学术层面而言,我认为若要使文化遗产发挥更为多元的作用,可对近百年来故宫博物院所藏古代文物及文物资料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并将其与当下的展览陈列、社会教育等方面紧密结合。20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将迎来建院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为此,我们筹备了众多用以纪念建院百年的项目,这些均是切实的举措,并非举办大型庆祝活动,而是更侧重于将故宫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充分展示,回馈社会。例如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工作,旨在让民众能够将故宫文化带回家中。故宫所研发的文化创意产品目前已广泛覆盖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即文化创意产品应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着重质量提升,更加关注产品的环保属性,以及使用者尤其是儿童的使用安全问题。

我们大力倡导“文化+旅游”“文化+社会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融合发展模式,强调深入挖掘城市中的文化遗产资源。借助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将这些资源进行更为全面的挖掘与系统的凝练。2017年,我们首次将《千里江山图》全卷展开,并举办了“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展览经媒体报道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纷至沓来。如今,通过展览以及一系列文创产品的开发,《千里江山图》已广为人知。人们将其元素运用于家居装饰、工作环境布置、展览背景设计以及室外活动策划等方面,此外,它还融入了交响乐、沉浸式互动体验艺术展、舞蹈表演以及春晚舞台,实现了多领域的跨界融合。

当下,在频繁的外交接待活动中,文化遗产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当外国来宾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我们会为其解读故宫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宫的红墙、黄瓦与蓝天,分别代表着三原色,理论上,这三种颜色能够调配出世界上的任何色彩。这象征着我们所处的世界本应是丰富多彩的,而非单调单一的。每个民族都拥有值得自豪的历史,也都理应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

(本报记者 吴晔 整理 通讯员 冯天磊)

发挥社交媒体中国际传播的民间力量

赵红娟

邵 静

仅仅是简单的用户迁移,更是体现了复杂的社会动力和网络行为。当今时代,一个平台面临的危机能够清晰地展现在全球化互联网世界中,社交平台作为数字空间的重要载体,成了国际传播民间力量的“聚集地”。小红书国际传播案例所呈现的社交媒体用户的流动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内容和社交需求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时代产物。

以共享内容吸引社交媒体中国际传播的民间力量

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强大的社区文化和创作者生态。与传统国际传播中注重宏大叙事的方式不同,社交媒体以个体视角切入,展示真实的生活片段,让各国用户能够以一种轻松、非正式的方式接触到中国文化。当下,社交媒体的流量逻辑已经成为超越政治、文化的强大力量。平台的算法更加注重用户的兴趣和行为,而非政治身份或国籍背景,基于人类共同经验的日常内容显得更具吸引力。网络平台通过流量的全球化布局,将内容创作者与用户的互动拓展至全球范围,社交媒体中的日常内容跨越了国别之间的政治鸿沟,跨国民间交往日益频繁。未来,社交媒体还可以通过加强本地化运营,邀请更多的跨国创作者参与内容创作,这不仅能够推动中外文化的互鉴与交流,还能激发出更多的原创内容和共创

IP,为中外用户提供跨文化对话的机会。通过创作者和品牌的合作,平台不仅能够提供多元化的内容,还能进一步拓展文化出口和品牌国际化路径,形成社交媒体中国际传播的良性循环。

以共情内涵凝聚社交媒体中国际传播的民间力量

除了日常内容的沟通与交流,社交媒体用户还可以进一步实现情感共鸣,即共情。面对网络空间的流动性,“共情”是国际传播中需要重视的一个手段,具体步骤是通过情绪的感染性特征来弥合国际传播中的文化鸿沟,提升传播效能。小红书的内容创作更注重重生分享,且不仅限于单向输出,更注重用户间的互动与参与。用户在小红书上不仅满足了暂时的社交需求,当他们逐渐发现平台的内容、文化和社区氛围能够与自身的兴趣和价值观“共情”时,便会决定长期驻留。对于国际传播来说,共情不只是对受众情感的迎合,更是通过多元文化共存,促使用户在交流中找到彼此的共同点。从TikTok上的流行挑战,到小红书上的生活分享,当我们鼓励不同语言背景的创作者分享他们的独特视角,用户在这些内容中看到的是自己情感的映射,或是对生活态度、兴趣爱好的认同与共情。而这种共情使得用户在情感上将自己与平台紧密相连,是推动用户长期驻留和文化认同的基础。

以共通未来延续社交媒体中国际传播的民间力量

“共通未来”倡导开放的、复数的对话与情感共鸣,它不仅需要内部的共情共鸣,也离不开外部的各类支持。“共通未来”需要法律监管,社交媒体需要在内容监管方面做出更多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和法律法规的调整,不仅要平衡内容的自由表达和监管,也要确保内容不违反社会规范和法律要求。“共通未来”需要政策支持,随着跨国用户数量的增长,如何保障用户的个人隐私尤其是跨境数据的安全,已经成为社交媒体面临的重要挑战。对海外用户来说,他们不仅希望能够自由分享自己的生活与观点,更希望在数字空间中得到应有的保护。“共通未来”需要创新盈利模式,为了确保海外用户的长期驻留,小红书需要探索多样化的盈利模式,结合社交电商、广告投放以及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确保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和内容创作的多元化,平台也要为创作者和品牌提供更多变现渠道,为用户带来更加个性化和精准的消费推荐,实现长期发展和用户留存。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

知名专家说

王学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项目“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晚近学术思想史、中西政治文化史比较研究,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著有《顾李学的近代境遇》等。



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始终在兼容并蓄中历久弥新,包容性与和平性是其突出特性。向全世界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一方面能够加深世界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另一方面也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就如何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四个“讲清楚”,不仅是新时代我们党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攻方向,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需要达成的总体目标。

要在对外传播中做到四个“讲清楚”,首先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客观而言,党的十八大前,我们面临的国际传播形势不容乐观,难题甚多,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些年来,我们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重理顺内外宣体制,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主动积极开行之有效的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

其次,加强对外文化传播交流平台的搭建。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为推动该倡议落地,需要完成大量平台搭建的工作。比如,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已成功举办两届的“良渚论坛”,国际化平台越搭越宽,各项成果顺利落实,正成为增进文明互鉴、凝聚合作共识的国际平台和文化品牌。

第三,加强对中华文明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总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强调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项目推进,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四川三星堆等重要的考古成果,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良渚古城遗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申遗成功打破了西方学术界认定的文明“三要素”,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东方模式”。

第四,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持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一步扩大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我认为“双创”是根本途径,实践中已涌现出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说当前受到年轻观众热捧的越剧,就为中国戏曲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示范。越剧的出圈不仅由于演员的个人魅力,还在于它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吸纳了许多现代舞台剧的表现形式,增强了沉淀感与互动感,这帮助越剧在海外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戏迷。再比如数字技术的赋能,这在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全球爆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黑神话:悟空》除了让更多外国人开始阅读《西游记》之外,游戏开发团队还通过实地的数字扫描让大量的文物古建获得了“数字新生”,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没有构筑起外国玩家游玩的壁垒,而是架起了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的桥梁。

(本报记者 张竞聪 整理)

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王学斌

从原来三段论中的“高校做基础、科研机构做技术、产业做转化”的模式中突破出来,往前端发展得特别快,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前沿性创新,冲到了整个技术创新的核心环节。传统模式中所讲的“产学研”相结合,企业是主体,实际上在数字时代,企业的主体地位大大提升。

创新范式的转变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能做的低垂果实都已经摘完,要想真正实现科学创新,要么得特别往深的看,要么得特别往远的看,要么依靠非常强大的工具,这依靠单个国家的科学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处理全球性复杂问题需要多国科学家的合作,而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关键就要把“数据”这个新要素纳入考量。

江小涓指出,在数字时代,大规模、大平台的创新优势特别突出。尤其是到达一个阀值之后,大模型可以达到小模型难以企及的优势,涉及新能力的自动生成。在同样的参数下,大模型实现迭代优化所用的步骤更少。如何保障新能力自发地生成?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看,要打破市场垄断,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一种关键的公共产品。